

釐清「高饒事件」的政治迷霧

——評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

● 慕 躬

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一書系統地梳理國內外權威資料及其中披露的歷史細節，以扎實的史料，客觀公允的史識，嚴謹的治學精神，着力釐清籠罩在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上的政治迷霧，使讀者得以更接近歷史真相。



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一書（以下簡稱《重考》，引

用只註頁碼），是作者積幾十年的研究功力，系統地梳理國內外權威資料及其中披露的歷史細節，以扎實的史料，客觀公允的史識，嚴謹的治學精神，着力釐清籠罩在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下稱「高饒事件」）上的政治迷霧，使讀者得以更接近歷史真相的一部中共黨史研究專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期間，1950年代發生的高饒事件未得到平反。根據鄧小平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處理得也是正確的」的意見（頁28、29），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歷史決議〉）仍維持「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的歷史定性，只是不再提「反黨聯盟」（頁29）。此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及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陸續出版的《劉少奇傳》、《周恩來傳》、《陳雲傳》、《毛澤東傳》等，都稱高饒事件是「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由此形成了關於高饒事件的官方敘史基本框架。

事實上，高饒事件的背景及其發生、發展過程，遠比傳統敘史更為複雜：一是事發突然，定性嚴重，變化太大、太快；二是關鍵情節牽涉中共最高層，真正知情者寥寥無幾；三是對後來的黨內鬥爭影響深遠，陸續受到批判的彭德懷、習仲勛、羅瑞卿等，均勾連到高饒「反黨」活動，造成新的錯案；四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的「罪證」，基本上就是當年高崗用來反對他的那些材料。這一切不能不給高饒事件蒙上層層迷霧，使其本來面貌更加模糊不清。

其實，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年譜》，《楊尚昆日記》等文獻，經意或不經意間披露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隨着中國社會開放度的相對提高和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史源擴展，近十餘年又出版了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趙家梁等歷史當事人的回憶錄，有關高崗問題的許多新史料陸續浮出水面。《重考》作者的研究功力在於，將官方出版物中的相關史料和當事人從不同角度回憶的歷史片斷，相互映襯，逐一勘比，將接近歷史原貌的事實真相漸次呈現在世人面前，使長期以來圍繞高饒

事件的緣起和處理過程所產生的諸多疑竇，相當程度地得到答疑和解惑。

一 考據細節與揭示真相

歷史的真相往往存在於史家對種種歷史細節的深入考據之中。由於高饒事件相關檔案資料過去長期封閉，致使中共黨史著述多限於闡釋官方既有結論，在許多關鍵環節上語焉不詳，難以令人信服。作者積六十餘年學術功力及對高饒事件的持續跟蹤研究，集中爬梳了1980年代以來官方教研機構編纂的黨史資料彙集和領導人文稿、年譜中分散透露的部分內情，將它們與最近十幾年當事人或知情者陸續出版的回憶錄、日記等多方連綴，仔細勘比，抽絲剝繭，從一連串的歷史細節中，悉心辨析出與高饒事件密切相關的人物關係，諸如毛劉、毛高以及高與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林彪關係的複雜變化，甚至瞬間翻轉的根由，由此逐步還原高饒事件的歷史真相。

《重考》的學術價值，首先在於揭示了高崗三大「罪行」的事實真相，通過事實證偽了如下成說：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挑動「批薄（一波）射劉（少奇）」；1953年秋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與饒漱石合謀「討安（子文）伐劉（少奇）」；1953年12月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反對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要求「輪流」做莊，企圖篡黨奪權。

關於高饒事件的官方敘史基本框架，都稱之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重考》將官方出版物中的史料和近十餘年當事人從不同角度回憶的歷史片斷相互映襯，逐一勘比，使圍繞高饒事件的諸多疑竇，相當程度地得到答疑和解惑。

作者分析了中共高層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戰略轉軌之際的意見分歧及歷史上積累的矛盾，證實「批薄射劉」、「討安伐劉」的出現，是毛澤東以他剛剛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來統一高層思想，並以此檢查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必然。

作者詳盡考察了高饒事件的背景和由來，細緻地分析了中共高層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戰略轉軌之際的意見分歧及歷史上積累的矛盾，多方考據了財經會議、組織工作會議的全過程，證實「批薄射劉」、「討安伐劉」場景的出現，是毛澤東以他剛剛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來統一高層思想，並以此檢查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必然。把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說成高崗就是挑動「批薄射劉」的禍首；張秀山（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是高崗與饒漱石結盟「反黨」的罪證，顯然與史實不符；把高崗的「輪流」說作為他陰謀篡黨奪權的罪證，更是移花接木，子虛烏有。

（一）「批薄射劉」辨析

《重考》據實論證，財經會議發生的「批薄射劉」，源於毛澤東在會議之前對薄一波主持出台的「新稅制」錯誤的定性。書中引用了1953年6月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和會議的決定，已確定新稅制「在政治上有原則性的錯誤」，「在組織上也是錯誤的」。毛要楊尚昆將批評「新稅制」錯誤的五個文件印發與會各同志的指示，表明已把「新稅制」作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交付討論。會議的方針，是「以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糾正脫離黨的統一領導的分散主義和財經工作中表現着的某些資產階級觀點」（頁66-67）。這些「資產階級觀點」都牽涉到劉少奇此前在對待資本家剝削、富農黨員、農業互助合作及有關城



高崗（資料圖片）

鄉資本主義政策上的諸多主張，曾被毛批評為「右傾」。因此，財經會議上出現對劉的批評，實質上是6月15日毛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報告的「題中應有之義」。

至於高崗在財經會議中的角色，《重考》引述當年親歷會議的張明遠（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副書記）的回憶，認為：高崗沒有那麼大的能力足以操縱會議的進程。真正引導批評薄一波並涉及到劉少奇的，是毛澤東6月15日那篇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批評了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思想，並指示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從思想上組織上講清楚。於是「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原來只在領導小組範圍對薄一波進行批評，後來變成在大會上進行，其聲勢自然就大不一樣了」，「由對新稅制的批評，到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等觀點的批判，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到七月中旬，出現了『批薄射劉』的局面」（頁76）。

而高崗在8月10日的會上發言已接近會議尾聲，其發言稿「不但請周總理看過，還經過毛主席審閱修改，也給少奇看過，他還同少奇當面交換了意見」，「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見和發言」。總之，高的發言稿「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頁78）。

（二）考證「討安伐劉」

關於高崗、饒漱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合謀「討安伐劉」，結成「高饒聯盟」，當年的罪名是「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林蘊暉仔細考證了以下歷史細節：安子文向張秀山傳達毛澤東指示，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要「檢查中組部的工作」，要張準備對中組部工作的意見（頁91）；劉少奇親自簽發邀張到京參會的電報（頁94-95）；毛對張的發言內容表示支持，並囑咐他「先找少奇同志談談」（頁93-94）；張在會上發言後劉對張表態說：「你在會上講的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我要作自我批評」（頁103）；以及事先高崗對張準備的意見表示要實事求是、要慎重等（頁95-97）。這些都表明把張秀山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說成是高崗與饒漱石「結盟」、饒與張相「勾結」反對劉少奇的陰謀，完全是「欲加之罪」的說辭。

關於劉少奇在財經會議上作自我批評之後，又在組織工作會議上再次作更為詳細和全面的自我批評

一事，《重考》專設一節，詳盡分析了劉再三作檢討的壓力，並非來自高崗或高與饒漱石的「合謀」，而是毛要以過渡時期總路線檢查中組部工作的必然。組織工作會議對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發展新黨員等三個決議所做的修改和補充，正是為糾正劉所檢討錯誤的一個正式結論（頁104-11）。

（三）澄清高崗的「輪流」說

關於毛澤東外出休假由誰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高崗提出「輪流」說。《毛澤東傳（1949-1976）》說的是195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是甚麼會議也說不清楚），毛提出在他去杭州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崗出面反對，主張由中央書記處成員「輪流」主持，暴露了他篡權的「野心」（頁118）。其疑點在於，既然毛明確交代由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何以會出面反對？目前各類出版物所述情節均甚模糊。《重考》綜合研究鄧、陳、毛的年譜後指出，有關毛外出休假由誰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12月15日、24日先後開過兩次會議，並作出過兩個不同的決定。以往的成說，把高崗在15日會議上主張「輪流」與24日會議的決定拉扯到一起，加以定罪，顯然是移花接木了。

12月15日的第一次會議是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重考》引述《毛澤東傳》、彭德懷1962年向中央遞交的「八萬言」申訴書、楊尚昆談高饒事件一文中的三種說法，

《重考》綜合研究鄧小平、陳雲、毛澤東的年譜後指出，有關毛外出休假由誰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1953年先後開過兩次會議，並作出過兩個不同的決定。以往的成說，把高崗在12月15日會議上主張「輪流」與24日會議的決定拉扯到一起，加以定罪，顯然是移花接木。

若干年來，圍繞高饒事件的研究大多是按照官方結論敘事，或者摘取片斷史料編織。《重考》蒐集了迄今可見的幾乎所有史料，對當年事件的緣起和經過逐一詳盡考證，得出許多與以往成說大相迥異的新解。

指出這三種版本實際上反映出兩種語境：一是如《毛澤東傳》所說，毛明確提議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二是如彭德懷所說，毛以徵詢意見的口吻提出他外出後應由誰人主持日常工作。楊說的雖與彭有點不同，即毛說：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少奇同志臨時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甚麼意見，但同樣是在徵詢大家意見，是一種討論問題的氛圍。正因為毛沒有明確指定由劉代理，於是劉馬上表示：「主席外出後的日常工作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頁118-20）會上，高崗、朱德表示贊成「輪流」，其他人表示仍應由劉少奇代理。在這種黨內高層會議上，在徵詢意見的語境中，高崗、朱德表明自己的意見，純屬正常現象。據《鄧小平年譜》記載，這次會議決定：「毛澤東外出期間中央書記處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彭德懷參加，集體討論解決問題」（頁122-23），並非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頁124）。

問題全在於，高崗在15日會後為動員他人贊成「輪流」進行了私下活動，為此鄧小平向毛澤東有所反映。12月24日，毛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上述第二個會議）才另有決定：「在毛澤東去杭州休假並主持起草憲法草案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頁158）《重考》所引史料無可辯駁地表明，當年定性高崗「反黨」的罪行，都是經不住歷史事實的檢驗的。

二 匡正成說與迭出新解

若干年來，圍繞高饒事件的研究大多是按照官方結論敘事，或者摘取片斷史料編織，缺乏嚴謹治學必備的素養。本書是關於高饒事件的第一部系統的學術著作，蒐集了迄今可見的幾乎所有史料，對當年事件的緣起和經過逐一詳盡考證，得出許多與以往成說大相迥異的新解。

（一）毛澤東何以拿高崗是問

有關向毛澤東反映高崗私下活動的情況，《毛澤東傳》的說法是：「十二月中旬〔時間模糊〕，正當高崗變本加厲地進行分裂黨、妄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刻，陳雲、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了高崗的陰謀活動」（頁151-52），既無具體日期，更無具體情節。《重考》引《鄧小平年譜》的記載：12月16日下午，鄧小平到毛處談話，表明鄧在會後次日第一個向毛反映了情況。關於高崗在15日會後的私下活動，除了鄧在1980年談到高崗「拉攏」他以外，作者還引述了趙家梁（高崗最後一任秘書）、張曉霽（張明遠女兒）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和彭德懷「八萬言」申訴書中披露的具體情節，指出高崗一散會即向鄧游說：劉少奇不穩當，不宜主持中央工作；當晚質問陳雲、次日質問彭德懷為何贊成由劉代理，不支持他主張的「輪流」（頁153-55）。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在聽過鄧小平反映情況後的第二天，「12月17日晨，同周恩來談話。下午五時半，同陳雲、鄧小平談話，晚上約周恩來一起談」（頁155）。陳雲在談話中把高崗在背後同他的議論全盤托出。這便是後來陳雲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揭發高崗向他說：「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的「私房話」。在史家看來，堅持以史料說話，不牽涉損害誰的形象的問題，關鍵是從交相印證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當年中共黨內高層內部的複雜政治生態。

經過作者的詳細梳理，接下來的事態發展如下：12月18日，上午，毛澤東同譚政談話；下午，先後同鄧子恢、李富春談話；晚上，同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談話。19日，下午，同黃克誠談話；晚上，同陳雲、鄧小平談話，並委派陳雲去高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代表中央向高崗游說過的有關方面負責人打招呼，通報高崗用陰謀手段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毛特地讓陳雲轉告在杭州休養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變意見，我與他分離，等他改了再與他聯合。」20日，上午，同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談話；下午，同劉少奇談話；晚上，同周恩來談話。21日，上午，同朱德談話；晚上，先後同羅瑞卿、陳毅談話。22日，上午，先後同楊尚昆、彭德懷談話；下午，同周恩來談話。23日，下午3時半，

同周恩來談話，4時40分，同高崗談話；晚上8時40分，同彭德懷談話，10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開會（頁155-56）。

《重考》多方匯總毛澤東如此密集的談話，指出這在中共建政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明顯是對高崗的私下活動進行對證，考慮如何處置。作者分析，當諸多黨的高級幹部把高崗的私下活動擺在毛的面前時，黨內情勢發生了急速變化，導致毛對劉少奇和高崗兩人重新作了估量和抉擇。毛下決心解決高崗的問題，是經過反覆權衡的。高崗的私下活動暴露後，他在黨內就處於極大的被動地位，即觸犯了黨內高層的組織紀律，屬非組織活動，這在黨內是犯大忌的。相比之下，劉少奇從財經會議到組織工作會議，一直對自己的錯誤進行公開檢討，顯得光明磊落，無懈可擊。在做了上述一系列對證、打招呼工作之後，毛才於12月24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在毛澤東去杭州休假並主持起草憲法草案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建議，決定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頁158），從而出現了毛由此前「批劉抬高」到「棄高扶劉」的轉折。

關於高崗私下傳播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言論等事，《重考》除引用張明遠、張秀山的回憶以外，還引述了王鶴壽、陶鑄、陳正人、馬明方、習仲勛、劉景範、張聞天、陳雲、李卓然、杜者蘅等高級幹部在1955年中共全國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頁129-30、142-44）。這些少

作者分析，當諸多黨的高級幹部把高崗的私下活動擺在毛的面前時，黨內情勢發生了急速變化，導致毛對劉少奇和高崗兩人重新作了估量和抉擇。毛下決心解決高崗的問題，是經過反覆權衡的。

為人知的文本記錄，使今天的人們能夠一窺當年中共黨內鬥爭的實況。

(二) 四中全會基調與方針相悖

在匡正成說方面，《重考》在考據上下了真功夫，對於長期司空見慣卻並不準確的史料，都鄭重地提出質疑並加以辨析。如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引用了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說毛在這個講話中不點名批判高崗，乃至嚴厲提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有「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頁159）。然而，作者仔細查證了引文的註釋，指出這段講話是轉引自1955年3月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時隔一年有餘，早已物是人非。倘若早在12月24日會議上毛就對高崗問題定性為「兩個司令部」，他怎麼會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怎麼會反覆強調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保高過關」的開會方針？這完全與史實相背。作者這種決不放過任何細節的治史態度，與傳統的官方敘史手法大相逕庭。

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指示開會的指導方針是一個作自我批評的「和平會議」，意在保護高崗「過關」。但是作者細心地發現，經毛審閱同意的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的報告，以及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都突出強調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在黨內製造分裂，利用某種派別作為他們的代理人的危險。既然如此，「帝國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

可能在我們黨內找到代理人」，就成為四中全會討論黨的團結問題的基調（頁180）。作者認為，這個與「保高過關」的指導方針相悖的會議基調，就埋下了要給高崗定性為「反黨」的變數。

(三) 四中全會轉向座談會之謎

四中全會後，根據官方記載：1954年2月中旬，受中央書記處的委託，周恩來主持召開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但中央書記處何時開會作出上述委託，在毛、劉、周、陳、鄧的年譜以及《楊尚昆日記》中均無記載。在現有公布的檔案文件中，既找不到中央書記處何時作出決定，又找不到劉少奇是否向毛澤東報告及毛持何種態度的文本記載，成為高饒事件由強調團結到定性「反黨」重大轉折的一個謎團。

對於這個頗為蹊蹺的轉折，作者從《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收錄的1954年2月10日劉少奇在四中全會閉幕所作結論講話中找到了答案。劉在講話中肯定這次全會開得成功之後，話鋒一轉，指高崗、饒漱石的檢討「還是不夠的」，但是，會上所有發言的同志都遵照毛澤東建議這次開會的方針，並沒有對這些犯錯誤的同志展開批評。接着劉說：毛對這次開會方針建議的目的，「就是要等候犯錯誤的同志覺悟……不是要把某些同志所犯的錯誤掩蓋起來。……為要改正錯誤，就必須揭露這些錯誤，必須取得其他同志的幫助」（頁203）。這

作者認為劉少奇在四中全會所作結論講話對會議基調的改變，以及隨後分別召開座談會進行面對面的揭發，是高饒事件的定性由黨內轉向與現實階級鬥爭相應的敵我問題的重要因素。

顯然是對毛先前提出的開會方針作了另一種解釋，即後續「必須揭露這些錯誤」。作者認為，劉的結論講話對會議基調的改變，以及隨後分別召開座談會進行面對面的揭發，是高饒事件的定性由黨內轉向與現實階級鬥爭相呼應的敵我問題的重要因素。

(四) 鮮為人知的事件後續

關於高饒事件的後續，作者廣泛搜集、查找資料，講述了由此牽連出的兩個「反黨集團」。首先，在東北局株連出一個以高崗為首的「反黨集團」，成員有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書中對張秀山等人怎樣被打成所謂「五虎上將」，較過去有了更翔實的敘述（頁263-90）；其次，在華東株連出一個所謂參加「高饒反黨聯盟」的「向明反黨集團」，這是過去的研究未曾有過的專門詳述。此事進而株連了山東分局和省、市的一大批幹部，受到撤職、降職、下放等長期不公正的對待。書中對上述發生株連的來龍去脈作了詳細考證和評論，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文本記載和歷史細節，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採取不同形式為高饒事件被株連的幹部陸續平反、改正的曲折過程（頁291-301）。作者這個考據，從一個重要側面澄清了鄧小平1980年對起草〈歷史決議〉意見中的一個說法：「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甚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頁29）這個說法顯然並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另外，本書還對饒漱石的「罪狀」之一，即當年中央文件所說：



饒漱石（資料圖片）

饒利用陳毅的謙讓，未經華東局會議討論，用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披露了新的反證史料。真實情況是，據饒的政治秘書艾丁的鄭重回憶，這件事的原由是出自毛澤東的主意，以華東沿海軍事任務繁重的理由，與陳商議，由饒兼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在毛的明確意見下，陳自然謙讓，饒幾次堅持由陳出任為妥，陳則認為由饒兼任「並無不妥」。直到饒主持華東局常委會，陳雖未參加但仍委託人轉達了「請饒政委擔任為宜」的意見。由於會議經過討論之後沒有不同意見，才將名單報中央審批，整個過程完全符合程序，可見後來中央文件所說的並不符合事實，致饒漱石再三檢討也過不了關（頁199-200，註50）。

(五) 蘇聯檔案披露的不同信息

鑒於國內資料不足而借助於國外檔案文獻的補充和對照，是《重考》一書的又一特色。得益於

關於高饒事件的後續，作者講述了由此牽連出的兩個「反黨集團」。首先，在東北局株連出一個以高崗為首的「反黨集團」；其次，在華東株連出一個所謂參加「高饒反黨聯盟」的「向明反黨集團」，這是過去的研究未曾有過的專門詳述。

《重考》總結導致高饒事件定性和處理的深層原因及歷史教訓，認為事件最根本的起因是照搬了斯大林關於黨內鬥爭的理論，正是在這種謬誤的黨內鬥爭理論指導下，把高崗的私下活動與國內外現實階級鬥爭直接掛起鉤來。

沈志華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991》，《重考》站到了國內外史料比較研究的前沿。例如：

1954年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談到中共黨內情況時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這些現象沒有蔓延，但是由於這些現象甚至影響到了中央委員會中的成員，因而不對其引起重視是不可能的。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正在草擬一份關於黨的團結統一的特別文件(頁237-38)。

2月2日，劉少奇、周恩來與尤金談話。從尤金記錄周的談話內容來看，幾乎歷數了高崗從散布「軍黨論」、「陝北救中央」、反對劉的言論、封官許願、拉幫結派，一直發展到圖謀取代劉坐上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把交椅等事例，基本涵蓋了後來的定性——「分裂黨」、「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等全部內容，並直接點明其性質是「反黨活動」(頁239)。

3月26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毛說：「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進行其秘密活動：聲稱擁護毛澤東和林彪，但是首先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這並不是針對具體的某幾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整個黨的團結的問題。」「正是因為分裂份子借他〔毛澤東〕的名義欺騙了很多同志，他才要迅速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否則黨派鬥爭就會像傳染病一樣在黨內迅速蔓延。」(頁241)

對於蘇方解密檔案提供的上述新信息，《重考》作了如下評論：由

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不難看出定性高崗「反黨」的背後原因是，高背着毛在高級幹部中散布毛私下與他談論對劉少奇不滿的言論被揭發以後，使毛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擔心本已存在的「蘇區」幹部與「白區」幹部之間的隔閡情緒進一步蔓延，直接影響到黨內高層的相互信任和團結，也使毛自己處於一種尷尬的困境。在權衡利弊以後，毛決定「迅速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與高劃清界線(頁241-42)。這雖然是毛在事後的分析，但也很有啟示意義。

值得關注的是，在四中全會召開前的2月2日，劉少奇和周恩來就向尤金講了後來定性高崗「反黨」的全部「罪行」，從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態勢來看，這絕非劉、周二人可以自行其事的，他們是否事先與毛澤東已有默契？這是值得深入挖掘史料進一步研究，也是從蘇方新信息中引出一個待研究課題。

《重考》一書，一反某些學者把別人鮮少知道的材料視為己有、私自「壟斷」的做法，而是將尤金與毛、劉、周關於高崗問題談話的四份解密原始檔案，以及1949年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ев)給斯大林的報告；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為高崗涉蘇各種問題所作專論；1962年彭德懷給中央「八萬言」申訴書的內容，包括作者為高崗被指「裏通外國」、「向蘇聯出賣情報」等「罪名」辯誣；為彭德懷所謂「高、彭聯盟」辯誣的文章資料(均為學界長期關注而不可得的珍貴史料)，一併作為「附錄」附於本書之後。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點，即把作者

歷經多年和多方努力所發掘出來的寶貴史料，毫無保留地公諸於學界。這種為史學界研究大開方便之門的「資料開放共享」之舉，非常值得稱道。

三 總結黨內鬥爭理論的謬誤及其惡果

《重考》在對高饒事件的起因、經過及其後果進行詳盡考據之後，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專門寫了「結束語」，着力總結導致高饒事件定性和處理的深層原因及歷史教訓。作者認為，事件最根本的起因是照搬了斯大林關於黨內鬥爭的理論，即「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頁314）；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愈尖銳。正是在這種謬誤的黨內鬥爭理論指導下，把高崗的私下活動與國內外現實階級鬥爭直接掛起鉤來，斷言：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表明，他們既然適應着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需要而企圖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就在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既然問題屬於階級鬥爭性質，與會者當然是鬥個你死我活，窮追猛打。親身參加座談會的張明遠回憶說：「揭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每天下午在周總理辦公室隔壁的小會議室進行，一開始火藥味就很濃，認為高崗散播對劉少奇的不滿，是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攻擊。有人提出高崗搞陰謀、有野心，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等。」但是正

如趙家梁所說，「不管高崗作何辯解，他在座談會都是孤立的」（頁208）。高饒事件被定性「反黨」，對此後的黨內鬥爭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只是如法炮製，更是步步升級，造成了一系列的惡果，給黨的事業和國家發展帶來了且深且痛的深遠影響（頁314-20）。

筆者拜讀過林蘊暉筆耕不輟的新著，深為先生在耄耋之年力求揭示歷史真相的執著精神所感動，也為先生扎實的學術功底而折服。通觀全書，敘事清晰，分析嚴謹，考據深入，視野開闊，在嚴格的史料考辨之下逐漸顯示出令人驚異和慨嘆的歷史真相；在中共歷史檔案還很不開放的條件下，着力揭示複雜歷史環境、人物關係及其演變，使不同層面的讀者有所裨益。

應該看到，《重考》一書的確在高饒問題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進展，但由於相關內部檔案甚少披露，官方機構文獻選集、選編的出版又多有主觀取捨和剪裁，目前事件本身的內幕仍存在不少疑點，尤其是關鍵性環節仍需進一步挖掘。學界若將相關的研究繼續推向前進，這部書堪為中共黨史、中國當代史、政治學等領域的有志學者，提供一個足資借鑒和獲得啟示的研究文本。對於一向關注中共黨史的其他讀者，特別是內地的幹部、知識界人士、青年學生，本書亦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重考》一書在高饒問題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進展，但由於相關內部檔案甚少披露，官方機構文獻選集、選編的出版又多有主觀取捨和剪裁，目前事件本身的內幕仍存在不少疑點，尤其是關鍵性環節仍需進一步挖掘。